

【民族学】

# 云南跨境民族多元历史文化与身份认同

谷 禾<sup>1</sup>, 谭庆莉<sup>2</sup>

(1.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34; 2. 云南财经大学 旅游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1)

**摘 要:** 云南跨境民族具有多元的历史文化, 与境外同一民族在族源历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共通点或差异。云南跨境民族的多元文化对其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处理好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问题, 必须正确认识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

**关键词:** 跨境民族; 多元文化;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867X (2009) 01 - 0060 - 05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由于历史与自然地理环境的诸多原因形成了少数民族多沿陆地边界聚居分布的传统格局。在我国漫长的边境沿线及其毗邻的周边国家之间, 世代居住着 30 多个跨境民族, 其中仅云南省就有 16 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境内外的跨境民族之间有着共同的血缘文化联系, 但又分属于不同的国家, 因而其身份认同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缘环境, 跨境民族形成了极为多元的社会文化, 对其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力图通过分析云南跨境民族的多元历史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关联, 展示其身份认同的独特性, 并解答其身份认同中显现的突出问题。

## 一、云南跨境民族历史文化

文化与身份认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很多时候人们正是以文化差异来界定不同的社会群体。没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就难以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因而, 也可以说各民族的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各民族往往依据本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习俗等文化特征因素来塑造、凝集其身份认同。

### (一) 族源历史

族源是影响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族源反映出跨境民族的起源、迁徙、演化和发展过程, 围绕族源形成的历史记忆和情感, 直接反映跨境民族的自我意识, 对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和

认同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从云南跨境民族历史源流的考证来看, 云南跨境民族族源具有两方面的特性: 一方面, 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内其他民族、以及跨境民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关系; 另一方面, 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的源流关系也极为密切。

根据语言系属划分, 云南跨境民族分为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和苗瑶语族。除了苗族、瑶族迁入较晚外, 三大族系都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土著民族。三大族系在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过程中, 彼此间还有吸收、同化、融合的主动与被动关系, 形成各民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整体格局。云南跨境民族的起源发展是云南民族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正反映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在云南土著居民的基础上, 氏羌族群和苗瑶族群南下, 百越族群西进, 百濮族群北上, 再加上大批汉族移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迁入, 使得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汇聚。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会, 又使同处于云南这一共同地域的多元民族文化逐渐趋同, 从而在多元之中增加了一体的格局。

另一方面, 必须注意到云南跨境民族发展演变过程的特殊性。在云南跨境民族向外迁徙扩散的过程中, 不断发生着分化融合。虽然近现代随着我国与周边邻国边界线的划定与确立, 造成这一地区众多少数民族跨境分布的格局, 但区内各民族间的文化血缘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其中最能够反映跨境

【收稿日期】2008 - 09 - 12

【作者简介】1. 谷禾 (1978 - ), 男,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 谭庆莉 (1977 - ), 女, 云南财经大学旅游学院讲师。

民族间共通性特征的在于对其族源的看法。以景颇族和佤族为例, 云南境内的景颇族传说, 景颇的祖先来自“木札省腊崩”(景颇语: “majoi shingrobun”, 意为: 平顶山)。缅甸境内的克钦族也有类似的传说, 称克钦人的发源地名叫“玛壮信克亚蓬”, 与云南境内的景颇族语“majoi shingrobun”音译基本相同, 意义相近。至于佤族, 云南佤族和缅甸的佤族都有类似的关于祖先源于巴格岱附近的“司岗里”的创世神话。这些族源传说, 尽管从民族史学的角度来看其真实性的有待考证, 但从跨境民族自身角度来看, 无疑体现出跨境民族中共通的民族性: “他们有着共同的起源, 共同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 虽然分居不同国家会受到异文化及生存环境的影响, 在共性之中会产生出某些方面的个性, 但其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基础仍会保留着较多历史上就共有的东西。”<sup>[1]</sup>随着跨境民族的社会变迁和外部因素影响, 跨境民族在文化上可能会出现种种变异, 但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 这些族源观念在跨境民族交往和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仍然会得到维系, 进而构成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基础。

## (二) 语言文字

云南 16 个跨境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 其中大部分还有文字。总体而言, 云南跨境民族聚居于边疆地区, 一般以使用本族语言为主。一些人口较少的跨境民族, 除使用本族语言外, 多能兼通本地人口较多、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其他民族的语言。如西双版纳的布朗族和拉祜族, 大多能兼通傣语和汉语。在民族文字方面, 云南 16 个跨境民族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文字, 主要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传统的民族文字, 如傣文和彝文。二是近现代外国传教士创制的拼音文字, 如景颇文、苗文、哈尼文、拉祜文、佤文、独龙文等。三是解放后由政府组织专家创制的民族文字, 有苗文、景颇文、拉祜文、佤文、壮文、傈僳文等等。

在语言文字方面, 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体现出极为明显的共性特点。例如, 壮族在越南被称为岱族和依族, 越南岱族和依族的语言属于壮语的南部方言, 在语音、语法、基本词汇方面与云南壮族的壮语基本一致。傣语有两种方言: 傣哪语和傣仂语。在境外, 傣哪语是缅甸掸邦地区“旱傣”通用的语言, 而越南、老挝的泰族和泐族, 缅甸南掸邦的“傣痕”及泰国的泐人均操傣泐语并使用傣仂文。缅甸掸族的掸文与傣绷文相同, 在文字体系上与傣哪文较接近。越南瑶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

系苗瑶语族瑶语支中的勉语, 与云南瑶族使用的勉语基本一致。老挝、泰国的瑶族使用的瑶语也与云南瑶族使用的勉语类似。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 也有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在语言文字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 如傈僳族。我国境内的傈僳语分怒江、永胜、禄劝三种方言。缅甸傈僳语则有多种方言土语, 仅克钦邦就有勒乌话、胡恰诺话、依木话三种。在各个方言土语中, 约有 40% 的词汇不同, 由此造成境内外操不同方言的傈僳族彼此通话困难。产生语言差异的原因, 主要是缅甸傈僳语受到克钦语和缅语的影响, 缅甸傈僳语中有不少词汇与克钦语或缅语相同或相近。<sup>[1]</sup>

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字差异除了受各自所在国、地区其他民族的社会文化影响外, 受所在国官方的民族语言政策影响也十分明显。以壮族为例, 我国 1955 年以壮族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 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并进行推广。在越南, 1961 年通过岱、依文字拉丁化方案后, 岱、依族也都开始使用拉丁字母拼写本族文字。虽然这几种文字方案有许多共性, 但壮文从汉语里借入较多词汇, 而岱语、依语则借用了越文和越化汉文的词汇, 从而产生较明显的差异。

语言文字是各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象征与载体, 也是本民族成员相互认同的重要文化特征, 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寄托着人们对于自身所属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厚感情, 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 引发人们的民族归属感、认同感, 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 一方面促进了跨境民族内部和境内外跨境民族之间的交往联系, 增进了相互间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维系着其民族认同。另一方面, 作为一国公民和社会成员, 跨境民族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又要受所在国的主流文化和制度政策影响。我国以及云南境外周边邻国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 对各自境内的跨境民族都有相应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 力图促进跨境民族与各国主体民族的融合。

## (三) 宗教信仰

跨境民族与宗教联系极为密切, 云南 16 个跨境民族都有广泛的宗教信仰, 其中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几乎全民信教。不同类型的宗教在分布上基本与民族分布相对应, 例如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在滇西南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傣族聚居区, 而天主教、基督教则主要分布在滇西中缅边界上段怒江大峡谷、下段阿佤山区和滇东南中越边

境沿线地区。这就形成云南边境地区众多民族与宗教跨国境分布的特殊现象。

宗教与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紧密联系,一旦某一群体信仰了某个宗教,当这个群体或其成员与其他社会群体或个人交往时,宗教就会成为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sup>[2]</sup>

从云南跨境民族与宗教的社会历史概况中可以看出,云南跨境民族与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中,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基本上是全民信教。而在信仰宗教的跨境民族中,许多宗教活动实际上已经民俗化,宗教信仰与跨境民族的传统、习惯融合在一起,成为其民族文化与心理素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宗教信仰或宗教认同已经成为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准,特别是对于全民信教的跨境民族,往往以是否信仰本民族的宗教作为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自己人”,“是否信奉某种教”、“是否遵循该种宗教的教规”成为全民信教内部相互认同的标志。<sup>[3]</sup>

另一方面,云南跨境民族与周边邻国的民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宗教联系。就上述云南跨境民族宗教传播发展历史来看,许多宗教直接或间接由境外传入,并为周边邻国同一民族所共同信仰。例如,南传上座部佛教是从缅甸传入的,信教的傣族与缅甸的掸族、越南和老挝的泰(仂)族以及泰国的仂人属于同一民族、信仰同一宗教,来往频繁,联系密切。重大的宗教活动往往由境外宗教人士主持,而与内地的宗教联系则较少。事实上,与云南接壤或毗邻的7个国家中,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是传统的佛教国家,天主教、基督教不仅在越南是重要的宗教之一,而且在缅甸、老挝、泰国也有很大影响。这就造成云南边境地区大量同一民族、同一宗教跨国境而居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基督教、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主要是外国教会和传教士依靠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不平等条约发展起来的。各教会和教派在云南的传教士严密控制所属教会的教务大权,划分地盘进行传教活动。客观上这些传教活动在边疆地区民族群众中起到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有许多消极影响,一些传教活动直接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服务,并对边境民族进行淡化祖国、民族观念和挑拨民族关系的宣传活动。例如由英国传教士编制,在云南景颇族中流传的景颇文课本中就明确写着“我们的领袖是英皇,英国女皇是全国之母”;美国传教士编制的

景颇文课本也明确写着“上帝祝福你——美国”等字样。由美国传教士永伟里及其长子永享乐、次子永生文编制的,在云南拉祜族中使用的拉祜文识字课本上写着:“汉人来了,我怕!”在教给中国教徒的每日饭前祷告词则是:“上帝啊,汉家压迫我们!”<sup>[3]</sup>这些传教活动直接破坏、毒化边境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和睦团结,削弱跨境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事实上,宗教并非完全是纯粹的“文化现象”,宗教与民族的结合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往往容易发展成为危害国家政治统一的极端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并被进一步“政治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者政治动员的工具。因而,对于处在特殊的地缘和社会文化环境中跨境民族而言,宗教与民族文化、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交织在一起后,成为其身份认同中最为敏感的部分。

#### (四) 风俗习俗

风俗习惯或者说民俗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并世代传承的思想、行为和语言现象,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跨境民族历史上大多缺乏较成熟的民族语言文字系统,因而各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护着其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另外,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的相近性,也促进着相互之间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推动相互之间的交往联系。

例如,云南的傣族与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龙族以及泰国的仂人等,在婚姻、重大节庆等方面的风俗习惯与云南的傣族大致相同。<sup>[4]</sup>当然,受各自所在国不同的社会制度、主体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影响,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之间在风俗习惯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相对于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跨境民族的风俗习惯较易受社会变迁影响,产生变异或中断。与此同时,通过与不同文化内容的融合,也会形成新的风俗习惯,促成民族文化的发展并对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 二、云南跨境民族多元文化与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社会成员的主观选择,但这种主观意识、行为往往要受到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从族源历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习俗上来看,云南跨境民族无疑是一个个具有独特社会历史特征的文化群体。围绕这一系列文化特征,云南跨境民族形成了其特定的身份认同形态,因而可说云南跨境民族

的身份认同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

从族源历史来看,云南跨境民族多起源于云南和我国西北、东南地区,在长期的迁徙和演化过程中,与中南半岛诸民族结成渊源与族缘上的亲密关系。这种复杂多样的族源和历史发展轨迹,也决定了云南跨境民族的多元文化特征。

这种复杂多元的族源历史和文化格局,对云南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形态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云南跨境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反映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特征,是中华民族形成演变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构成跨境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中,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斗争、混杂、融合,同时也有分化和消亡,形成了一个由众多民族你来我去,此兴彼替,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各具个性,又具有多层次共性的统一体”。<sup>[5]</sup>在云南跨境民族群体中,一些属于同源异流,如彝族和哈尼族、阿昌族、傈僳族、拉祜族等,在历史由共同的先民分化而来,并且与古代中国西北的氏羌游牧民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另外,汉族在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也起到重要影响。通过汉族移民的传播和经济文化交流,内地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被广泛传播到跨境民族中,跨境民族中诸多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等,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吸收过程中,汉文化被有选择地改造变通,融入跨境民族自己的文化体系,形成了跨境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例如壮族、布依族受汉文化影响,在语言上借用了大量汉语词汇,并将这些汉语融入到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中。跨境民族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部分,无疑是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迁徙、演变,现今的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的民族大都与云南和我国南方诸民族有着渊源关系和亲密联系,各民族间的族源历史和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共性非常明显,以致一些学者甚至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角度认为云南与中南半岛同属一个文化圈。<sup>[1]</sup>由于历史、地理的紧密联系,以及民族文化的共源性,使得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有相互认同的历史渊源、保存着大致相同的风俗习惯、有着基本或部分相通的语言;在经济文化,以及因地缘、姻缘、亲缘等形成的社会交往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样的联系并没有因为近代国家边界的划分而中断。这就形成了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其中

最为突出的就是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这种超出国界的文化认同正是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独特之处,成为影响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必须指出,包括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在内的文化认同,仅仅反映出身份认同的一面,身份认同中重要的另一面是以国家或国民认同为形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既存在紧密联系,又存在一定的分立。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认同是实现政治认同的基础,具有共同的文化历史、宗教信仰的社会群体更易于形成统一的政治认同,由于文化认同产生的心理上亲近感、归属感,是通向统一的政治认同的铺垫。另一方面,文化认同并不必然通向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并不完全具有对等的意义。事实上,跨国文化认同现象在今天民族、国家间的交往中非常普遍,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移民的跨国文化认同。以海外华人为例,许多国家都存在华人群体,虽然具有不同的国籍身份,也不属于一个统一的民族,但大多与中华文明在某些方面保持有联系,对中华文化有亲近感、认同感。但是,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并不意味着缺乏对所属国的认同。陈志明在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时提到:“在马来西亚受中文教育的人或者那些从事华文教育运动者,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马来西亚意识。这些华人可能推动华人文化的认同,但现在他们都已认同马来西亚国籍,事实上如果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提出质疑,他们会感到气愤。如果他们表现出更大的族群情感,那是因为他们完全认同了马来西亚,因此期望与主体民族拥有同样的待遇。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在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力来促进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界定马来西亚华人认同。关键在于他们的行为不能认为是对马来西亚的不忠或他们的马来西亚意识淡化。”<sup>[6]</sup>从中可以看出,文化认同包括跨国文化认同并不必然导致对母国的国家认同以及对所属国的国家意识的淡化。

上述跨国文化认同现象反映出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分立关系。就跨境民族而言,虽然存在多元复合的文化认同现象,但这种文化认同形态并不必然导致政治认同上的分裂。事实上,由于历史上历代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及建国以来的社会政治建设,加之长久形成的中原汉族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云南跨境民族在整体上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国民认同感,这种政治认同感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因为文化认同上的多元性而有所削弱。然而,区别于移民的跨国文化认同,跨境民族由于处

在特殊的国家边界交接地带,许多情况下其文化认同往往与政治认同交织在一起,使得其身份认同变得极为复杂和敏感。

特别要注意到,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是云南跨境民族文化认同中的主要内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许多跨境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宗教文化已成为其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宗教经常被“政治化”而介入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政治化”的倾向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边境地区复杂的地缘和社会环境,以及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往往会滋生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各种危害国家政治统一的行为。因而,虽然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存在一定的分立关系,但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并不完全是孤立的文化认同,在国家边界交接地带,跨国界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经常会冲击甚至危及到对国家政治认同的统一性。我国实行多元民族文化并存、宗教信仰自由的国策,但需要认识到,个体或群体文化认同上的多元性不能损害政治认同上的统一性。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联在西方移民国家的政策中也有较充分的反映。目前,“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移民国家主流社会意识观念;但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在接纳“文化多元主义”的同时,都极为维护其政治的一体性。马戎教授以美国为例说,在美国,“文化多元主义”有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前提,即美国各族群的“文化多元”是在全体美

国国民保持“政治一体”的大前提下才可以存在的,即美国的主流社会在容忍“多元”的同时,绝对没有放松“一体”的一面。美国严格限制各个种族、族群团体去发展其“政治性”,而是允许甚至鼓励其向“文化群体”的方向发展。为了加强“文化多元”之上的“政治一体”,美国等国家在意识形态导向上极力淡化“族群认同”的意义,而不断强化本国各族民众对“美国公民”这一共同身份的认同意识。<sup>[12]</sup>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各国,也积极建立国家层面的共同性“文化”,如推广“族际共同语”,推崇主流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等等。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在现实生活中,政治认同往往要高于文化认同,而在多数情况下,文化认同还要服务、服从于政治认同。

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中华民族的认同时总结道:中华民族的认同具有多层次性,“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sup>[15]</sup>因而,我们可以将跨境民族多元复合的文化认同形态视为不同层次的文化认同,各层次的认同具有各自的特点,都是跨境民族多元文化认同的组成部分。但在各种层次的文化认同之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国家(国民)的认同是更高层次的政治认同,也是身份认同的核心。因此,尽管跨境民族存在语言、宗教信仰等文化认同差异,但其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必须是统一的。

#### 参考文献:

- [1] 赵廷光. 云南跨境民族研究 [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8.
- [2] 马戎.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3] 郑杭生. 民族社会学概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4] 申旭, 刘稚.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 [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8.
- [5]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
- [6] 陈志明.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 [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4, (6).

#### The Multi-histories and Multi-cultures of the Cross-border

#### Ethnic Groups of Yunnan and their Identities

GU He<sup>1</sup>, TAN Qing-li<sup>2</sup>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650034;

2. School of Tourism,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Abstract:** Th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of Yunnan have their multi-histories and multi-cultures and share with their partners abroad some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history, language, religion and custom but maintain some differences. The multi-cultures of th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of Yunnan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ir identities and a successful handling of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such identities relies on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ir political identity.

**Key words:**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multi-cultures; identity

(责任编辑 杨镇圭)